

# 霸权护持战略与东亚地区主义的弱化

——兼论中国的战略机遇与选择\*

夏方波

[内容摘要] 冷战结束以来,东亚地区合作呈现蓬勃发展之势,以“东盟方式”为代表的开放地区主义一度被视为非西方地区合作的典范。然而,近年来东亚地区主义呈现出明显的弱化趋势,表现为制度竞争加剧、共识基础动摇、一体化进程迟滞乃至“逆地区化”。传统的内外因分析虽各有洞见,但未能充分揭示主导性外部力量与地区秩序演变之间的内在关联。基于“霸权护持”的分析视角,本文认为东亚地区主义的弱化根源于美国霸权护持战略的演变及其与地区内在脆弱性的互动。美国的霸权护持战略对东亚地区主义实施了工具性改造,通过观念塑造、利益诱导、话语建构、机制重塑和施压胁迫等多元策略,侵蚀地区合作主导权、弱化过程规范、解构地区认同、扭曲一体化逻辑,启动地区主义的“弱化螺旋”。在案例研究部分,对美国在寻求均势与实施遏制两个阶段的研究验证了其霸权护持战略如何促使东亚地区主义从层次化走向竞争化。面对特朗普 2.0 时代的挑战,中国应基于“四大全球倡议”“人类命运共同体”等主张,强化对东亚地区合作机制的投入与认同建设,推动构建非对抗性的地区秩序。

[关键词] 霸权护持 地区主义 亚洲合作 东盟中心地位

[作者简介] 夏方波,北京外国语大学国际关系学院讲师

[中图分类号] D83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2095-5715(2026)02-0024-29

---

\* 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青年项目“东南亚政党政治‘家族化’与家族政治‘政党化’的逻辑、影响及中国对策研究”(项目编号:25CGJ088)的阶段性成果。

## 一、问题的提出

冷战的终结为东亚带来了“和平红利”，地区主义也随之蓬勃兴起。在以经济发展为核心的共同愿景驱动下，东亚地区合作取得丰硕成果。从亚太经济合作组织的建立，到“东盟+3”、东亚峰会等一系列机制的涌现，东亚地区逐渐构建起多层次的合作网络。这一进程中形成的“开放的地区主义”，因其独特的实践路径而备受瞩目，其并未复制欧洲基于主权让渡和强法律约束的一体化模式，<sup>①</sup>而是在东盟的引领下，开创了以协商一致、非正式性和包容性为核心的“东盟方式”。<sup>②</sup>这种更为灵活的规范降低了合作门槛，成功地将政治制度、发展水平和文化背景迥异的国家凝聚在一起，并巧妙地维持了东盟在地区架构中的中心地位。

然而，这一模式在取得巨大成就的同时，也内含着较为明显的脆弱性。低门槛和广泛的议题导致了地区合作理念的竞争，形成了功能重叠、成员各异的“意大利面条碗”，<sup>③</sup>造成了制度碎片化与拥堵。更重要的是，地区合作的共识局限于经济层面，在涉及主权与安全的敏感领域，一体化进程难以深化。这种内在的脆弱性使得东亚地区主义在面对外部环境的剧烈变化时显得韧性不足。进入21世纪第二个十年，随着地缘政治格局的演变，特别是美国政府相继推出“重返亚太”及“印太战略”，东亚地区主义的黄金时代似乎悄然落幕。大国竞争的阴影笼罩了东亚地区，地区合作的逻辑与形态也随之发生了变化。

---

<sup>①</sup> 欧洲一体化模式以新功能主义为理论基础，强调通过特定功能领域的合作（如煤钢联营）产生功能性外溢，最终推动政治一体化。这一路径在内部异质性巨大的亚洲缺乏现实土壤。参见 Peter J. Katzenstein, *A World of Regions: Asia and Europe in the American Imperium*, Ithaca, NY: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2005, pp. 145 ~ 148。

<sup>②</sup> “东盟方式”是东南亚国家在长期互动中形成的一套行为准则，强调不干涉内政、协商一致、照顾各方舒适度等，其成为东盟主导的地区多边主义的核心规范。参见 Amitav Acharya, *Constructing a Security Community in Southeast Asia: ASEAN and the Problem of Regional Order*, 3rd ed,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4, pp. 6 ~ 7。

<sup>③</sup> “意大利面条碗”或“制度拥堵”形象地描述了亚洲地区存在大量功能重叠、成员各异的多边合作机制，导致协调成本高昂、效率低下。参见 Richard E. Baldwin, “Managing the Noodle Bowl: The Fragility of East Asian Regionalism,” *The Singapore Economic Review*, Vol. 53, No. 3, 2008, pp. 449 ~ 478。

上述变化可称为一种“逆地区化”，<sup>①</sup>其表现是多维度的：首先，地区合作的“发展”逻辑被“安全”所挤压。经济议题被高度“安全化”，历来以合作为基调的贸易、技术与投资等被置于地缘政治对抗的框架下审视。其次，地区身份建构从多元包容走向二元对立。昔日构建统一“亚洲身份”的努力，正被基于价值观和阵营选择的“民主对抗威权”叙事所取代，分割出“我们”与“他们”的界限。再次，东亚地区主义的开放性这一宝贵特质正在褪色。包容与多边主义精神受到以“四边安全对话”“澳英美联盟”为代表的、具有鲜明俱乐部色彩和排他性的“小多边主义”安排的冲击。最后，作为亚洲地区合作代表性产物的“东盟方式”面临合法性危机，其通过非正式协商和软性制度主义来平衡大国、约束现实政治行为的核心规范目标，<sup>②</sup>在地缘博弈面前显得力不从心，其有效性受到质疑。

综上所述，地区主义的转变使得东亚地区正在从以经济为导向、追求包容性合作的开放体系向着由地缘政治竞争塑造的排他性和对抗性场域滑落。既有的分析将这一弱化趋势归因于两个方面，其一是地区内部的脆弱性，认为其制度基础和共识根基的薄弱是问题的核心，使其成为松散、非正式和网络化的“软地区主义”。<sup>③</sup>地区内主要行为体——大国与中小国家的能动性也加剧了规范的困境。一方面，地区大国为争夺议程设置权和主导地位展开竞争，导致制度供给的碎片化；另一方面，广大中小国家普遍采取对冲战略，削弱了地区主义的集体行动能力。<sup>④</sup>其二是大国竞争，认为地缘政治竞争的加剧导致东亚地区主义成为大

① “逆地区化”指地区主义进程发生停滞甚至倒退的现象，表现为地区合作水平下降、制度衰败、认同削弱等。参见耿协峰：《全球化进程中的逆地区化现象透视》，《人民论坛》2022年第Z1期，第98～102页。

② John J. Mearsheimer, *The Tragedy of Great Power Politics*, New York: W. W. Norton & Company, 2001, pp. 7～9; 魏玲：《关系、网络与合作实践：清谈如何产生效力》，《世界经济与政治》2016年第10期，第39～58页。

③ Peter J. Katzenstein, *A World of Regions: Asia and Europe in the American Imperium*, Ithaca, NY: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2005, p. 220; T. J. Pempel, “The Race to Connect East Asia: An Unending Steeplechase,” *Asian Economic Policy Review*, Vol. 1, No. 2, 2006, pp. 237～254; 李巍：《东亚经济地区主义的终结？——制度过剩与经济整合的困境》，《当代亚太》2011年第4期，第6～32页；王明国：《国际制度复杂性与东亚一体化进程》，《当代亚太》2013年第1期，第4～32页；莫盛凯：《没有地区主义的东亚合作》，《当代亚太》2014年第2期，第96～117页；齐尚才、张韵：《有限社会化、非均衡激励与东亚合作的退化》，《东南亚研究》2025年第1期，第91页。

④ Kuik Cheng-Chwee, “The Essence of Hedging: Malaysia and Singapore’s Response to a Rising China,” *Contemporary Southeast Asia*, Vol. 30, No. 2, 2008, pp. 159～185; Evelyn Goh, “Great Powers and Hierarchical Order in Southeast Asia: Analyzing Regional Security Strategies,”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 32, No. 3, 2008, pp. 113～157; 刘若楠：《大国安全竞争与东南亚国家的地区战略转变》，《世界经济与政治》2017年第4期，第60～82页。

国博弈的重点领域,其原有的合作功能被迫让位于服务大国地缘政治目标的竞争功能,是其趋于弱化的根本原因。<sup>①</sup>亦有学者强调东亚的地区主义建设本身是关于“何种地区主义”以及“谁之地区主义”的争论,认为东亚“竞争性多边主义”“竞争性地区主义”兴起的特征是合作导向从经济转向安全,制度竞争从规范之争转向理念价值之争。<sup>②</sup>上述理论为东亚地区主义的弱化现象提出了不同的解释,但在分析近年来东亚合作弱化进程呈现出的复杂动态时仍存在一定局限性,未能充分揭示主导性外部力量与地区秩序演变之间的内在关联,也未能提供历时性的一致解释。因此,本文探讨的核心问题是:霸权国针对东亚地区主义的政策逻辑是什么?霸权护持战略通过何种策略和机制干预、分化乃至重构地区合作框架?

## 二、美国霸权护持与东亚地区主义的互动及其弱化逻辑分析

基于“霸权护持”的分析视角,本文认为东亚地区主义的弱化,根源于美国霸权护持战略的演变及其与地区内在脆弱性的互动。此理论框架重点关注霸权护持战略转型的逻辑起点、策略组合及其后果。美国的霸权护持战略对地区主义进行了工具性改造,通过观念塑造、利益诱导、话语建构、机制重塑和施压胁迫等多元策略,侵蚀地区合作的主导权、弱化过程规范、解构地区认同、扭曲一体化逻辑,从而启动了地区主义的“弱化螺旋”。

### (一) 霸权护持的行动逻辑:从“离岸平衡”到“遏制挑战”

“霸权护持”是指霸权国为维持其在国际体系或特定地区中的主导地位而采取的一系列动态战略行动,重塑地区秩序本身成为实现这一目标的关键途径,具

---

<sup>①</sup> Amitav Acharya, “The Myth of ASEAN Centrality?” *Contemporary Southeast Asia: A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and Strategic Affairs*, Vol. 39, No. 2, 2017, pp. 273 ~ 279; 吴琳:《中美制度竞争对东盟中心地位的冲击——以东盟地区论坛(ARF)为例》,《外交评论》2021年第5期,第88~117页;周士新:《美英澳安全伙伴关系削弱东盟中心地位的战略行为分析》,《亚太安全与海洋研究》2022年第3期,第64~83页;耿协峰:《比较地区主义视角下“全球南方”崛起的实践逻辑》,《太平洋学报》2025年第2期,第1~14页。

<sup>②</sup> 贺凯:《亚太地区的制度制衡与竞争性多边主义》,《世界经济与政治》2018年第12期,第60页;张弛:《竞争性地区主义与亚洲合作的现状及未来》,《东北亚论坛》2021年第2期,第85~99页。

体的护持过程包括追求塑造有利于其维持优势、控制风险和应对挑战的地区环境。<sup>①</sup>相应地,霸权护持战略的选择也倾向于多元化,既可以是基于物质实力的硬制衡,也可以通过发起、利用和主导多边制度来实现软制衡。<sup>②</sup>其中,地区主义作为构建地区秩序的基本单元,是地区内国家间权力分配、制度安排和规范认同的集中体现,自然成为霸权国延伸影响力、分担治理成本、巩固主导地位的核心渠道之一。不过,需要从动态变化的角度来审视和了解霸权护持的行动逻辑,其会随着霸权国对战略环境,特别是对潜在挑战者威胁程度的认知变化而演变。<sup>③</sup>

其一,低威胁环境下的离岸平衡与选择性参与。当霸权国未感知到能够系统性撼动其地位的挑战者时,其护持战略的核心目标是维持稳定与防止挑战。正如查尔斯·克劳萨默在提出“单极时刻”概念时所预示的,美国在后冷战时代的主要任务是管理和维持其优势地位,防止新的全球性挑战出现。<sup>④</sup>在此阶段,霸权国的主要关切是防止地区出现可能孕育未来挑战者的、具有排他性的封闭集团,同时确保自身能够以较低成本参与地区事务,以塑造议程、获取利益。在此逻辑下,霸权国对地区主义采取以离岸平衡和选择性参与为主的策略,确保其发展轨道符合自身长远利益。<sup>⑤</sup>因此,美国乐于看到由其盟友或友好力量发挥重要影响、制度松散、经济开放的地区主义框架的长期存在。这种地区主义被美国视为确保其霸权地位的“稳定器”,既能提供经济利益和地区稳定,又不足以对其主导地位构成威胁。霸权国的行动主要体现在:第一,确保开放性,通过主导亚太经合组织等跨区域机制,将地区主义的地理边界扩展至泛太平洋,以此稀释纯粹的“东亚”身份认同;<sup>⑥</sup>第二,设定红线,对“亚洲货币基金组织”等任何可能挑战

---

① William C. Wohlforth, “The Stability of a Unipolar World,”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 24, No. 1, 1999, pp. 5 ~ 41.

② Kai He, “Institutional Balancing and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eory: Economic Interdependence and Balance of Power Strategies in Southeast Asia,” *Europea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Vol. 14, No. 3, 2008, p. 493.

③ Stephen G. Brooks and William C. Wohlforth, *America Abroad: The United States’ Global Role in the 21st Century*,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6, pp. 75 ~ 77.

④ Charles Krauthammer, “The Unipolar Moment,” *Foreign Affairs*, Vol. 70, No. 1, 1990, pp. 23 ~ 33.

⑤ John J. Mearsheimer, “The False Promise of International Institutions,”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 19, No. 3, 1994/1995, pp. 5 ~ 49.

⑥ C. Fred Bergsten, “Open Regionalism,” *The World Economy*, Vol. 20, No. 5, 1997, pp. 545 ~ 565.

其核心利益的自主性倡议予以坚决否决;<sup>①</sup>第三,权力制衡,利用地区大国之间的竞争关系,确保没有任何单一地区大国能够主导地区合作的走向,保持地区主义的松散与多元化。在此环境中,霸权护持与地区主义之间是有限塑造的关系,霸权国通过间接的方式为地区主义设定发展轨道和边界。

其二,高威胁环境下的整合性遏制与体系重塑。当霸权国明确识别出战略竞争对手,并认为其霸权地位受到严重威胁时,其护持战略的核心目标转变为维持优势与遏制挑战。此时,霸权国的战略逻辑从关心绝对收益转向关注相对收益。对霸权国而言,原有的开放地区主义,因不可避免地将竞争对手纳入其中,并为其提供了发展资源和合法性平台,无异于加速了挑战者的相对实力增长,而对霸权国自身则难以持续提供有利的资源配置功能,地区主义便从“稳定器”转变为“战略负资产”。在此逻辑下,霸权国倾向于放弃维持现状,致力于对地区秩序进行全面的体系重塑,以消解其原有的开放性与包容性,将其改造为服务于自身大国竞争战略的工具,核心手段是整合性遏制。<sup>②</sup>这种遏制是多维度的,包括物质性、网络性和观念性三个权力维度:在物质性维度,美国通过现代产业战略和“去风险”话语,力图重塑排除其战略对手的全球供应链;<sup>③</sup>在网络性维度,美国通过构建复合盟伴体系发展小多边主义,推动跨区域联盟联动,以排他性的安全制度来推动开展针对性的资源配置,并提升战略资源的交换效率;<sup>④</sup>在观念性维度,美国则大力渲染“民主对抗威权”的叙事,动员意识形态竞争,分化地区认同与合作的共识基础。<sup>⑤</sup>在此阶段,霸权护持与地区主义之间是主动改造与反塑造的关系,霸权国倾向于深度干预地区主义的内部运作,将其议程、架构、规范和认

---

① Michael R. King, “Who Triggered the Asian Financial Crisis?” *Review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al Economy*, Vol. 8, No. 3, 2001, pp. 438 ~ 466.

② 赵明昊:《美国霸权护持战略的调适与中美关系的未来》,《外交评论》2023年第5期,第19~47页。

③ Henry Farrell and Abraham Newman, “Weaponized Interdependence: How Global Economic Networks Shape State Coercion,”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 44, No. 1, 2019, pp. 42 ~ 79.

④ Mira Rapp-Hooper, *Shields of the Republic: The Triumph and Peril of America's Alliances*,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20, pp. 192 ~ 198; 魏冰:《大国竞争、联盟体系困境与美国亚欧联盟联结》,《外交评论》2024年第6期,第101~128页。

⑤ Larry Diamond, “Facing Up to the Democratic Recession,” *Journal of Democracy*, Vol. 26, No. 1, 2015, pp. 141 ~ 155.

同改造为服务于其大国竞争战略的工具。

(二) 霸权护持改造东亚地区主义的多元策略

为塑造有利于自身的地区环境,霸权国(美国)运用了一套相互配合的多元策略(见表1),作用于东亚地区主义的特定层面。

表1 美国改造东亚地区主义的多元策略

策略	核心逻辑	主要手段	针对目标	权力属性
观念塑造	争夺道义制高点,构建合法性	推广“民主对抗威权”的宏大叙事;资助非政府组织、媒体,进行价值观输出;将地区议题意识形态化	针对地区国家的认知与身份认同,旨在分化地区国家,构建“价值观同盟”	软实力、规范性权力
利益诱导	改变成本—收益计算,提供替代性合作选项	提供选择性、排他性的“替代性收益”;安全上,强化双边同盟、军售、情报支持;经济上,通过“印太经济框架”等“俱乐部式治理”许诺市场准入与技术合作	针对特定国家(战略摇摆者)的政策选择,旨在用“小恩小惠”换取其在关键议题上的战略追随	硬实力、结构性权力(利益交换)
话语建构	制造安全焦虑,为干预行动提供正当性	系统性地建构“中国威胁论”;将经济问题“安全化”“去风险”;利用官方报告、媒体宣传、智库研究等方式制造和渲染威胁感	针对地区国家的安全观与公众舆论,旨在提升其安全焦虑,使其更倾向于寻求美国保护	软实力、话语权力
机制重塑	绕开并替代旧机制,建立由美国主导的新秩序	创建平行的替代性制度;安全上,建立“四边安全对话”“澳英美联盟”等小多边机制;经济上,主导“印太经济框架”,绕开并削弱东盟的中心地位	针对以东盟为中心的地区合作架构,旨在将其边缘化,建立由美国主导的网络化、阵营化新架构	硬实力、制度性权力
施压胁迫	提升不合作的成本,压缩他国战略自主空间	利用政治或同盟关系、金融和技术标准的主导地位进行胁迫;经济上,实施单边制裁、出口管制、长臂管辖(如针对华为);外交上,公开喊话,要求盟友“选边站”	通过惩罚性措施,迫使不愿完全顺从的国家(包括盟友和中立国)改变政策	硬实力、强制性权力

资料来源:笔者自制。

第一,通过观念塑造争夺道义制高点。观念塑造是霸权护持战略的制高点,其核心在于建构一套具有道德吸引力和普遍性的宏大叙事,从而为其地缘政治行动提供合法性依据,并为分化地区国家奠定认知基础。在美国对东亚地区主

义的改造中,观念塑造的核心是构建并推广“民主对抗威权”的二元对立框架,将大国实力竞争转化为关乎价值观和政治制度存亡的斗争。美国通过官方演讲、外交辞令、资助非政府组织和媒体等多种渠道,将自己定位为“基于规则的自由开放秩序”的捍卫者,而将其战略对手描绘成试图颠覆这一秩序、推广“威权模式”的修正主义力量。<sup>①</sup> 观念塑造的策略通过强调意识形态的差异,人为地在东亚地区内部划出价值观界线,侵蚀地区合作原有的、基于地理邻近和共同发展利益的认同基础。这一叙事增强了那些政治制度上与美国相近的国家与美国结盟的政治合法性;而对于那些奉行不同政治模式或希望维持中立和自主的国家,则施加了巨大的道德和政治压力。通过将南海争端、人权议题等问题都纳入该叙事框架,美国力图推动地区议程“政治化”和“意识形态化”,使得原本可以进行技术性、功能性合作的领域也充满了零和博弈的色彩。托马斯·里塞等学者将之归纳为“修辞性行动”,即战略性地运用共有规范和价值观来规训对手、动员盟友。<sup>②</sup> 最终,这种策略在地区内制造意识形态分野,为分化地区国家、构建“价值观同盟”奠定基础,进而破坏了地区主义所必需的包容、互信和求同存异的合作氛围。

第二,通过利益诱导提供替代性收益。利益诱导是霸权护持战略中最具操作性的工具,霸权国利用自身在经济、科技和安全领域的超强实力,向目标国家提供“替代性收益”,以此改变其成本收益计算,诱导其偏离原有的合作轨道。这一策略的关键在于选择性的利益输送,针对那些战略上更为关键或容易动摇的国家,以最小的成本实现最大的战略效果。在安全合作领域,美国通过强化双边同盟承诺、增加军事援助、提供先进武器装备和情报支持等方式,提升特定盟友对抗其共同对手的信心和能力。这对于那些与霸权国的对手国存在领土或安全争端的国家而言尤其具有吸引力,这些国家更愿意在战略上与美国捆绑,从而在地区主义框架内采取更具对抗性的立场。在经济和科技领域,美国则通过构建

---

<sup>①</sup> 陈琪、柳棕耀:《国际规则视角下的修正主义:特朗普政府对国际秩序的态度分析》,《当代亚太》2020年第3期,第69~96页。

<sup>②</sup> Thomas Risse, “‘Let’s Argue!’: Communicative Action in World Politics,”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Vol. 54, No. 1, 2000, pp. 1~39.

排他性的合作安排,如“印太经济框架”向参与国许诺在数字贸易、供应链韧性、清洁能源等前沿领域获得市场准入和技术合作的机会。这种“俱乐部式治理”通过设立高标准的准入门槛,来筛选成员、分配利益,并排斥不符合其标准的国家。<sup>①</sup> 通过选择性的利益输送,美国希望瓦解地区国家原有的、基于纯粹经济效率的合作逻辑,迫使其在经济决策中更多地考虑地缘政治因素,从而服务于美国重塑地区供应链、削弱对手经济影响力的战略目标。

第三,通过话语建构制造威胁与焦虑。话语建构是霸权护持战略开展心理战和认知战的关键所在,其核心在于通过持续不断地推动议程设置和信息传播,制造和渲染来自战略对手的威胁感,从而为自身的干预行动提供正当性,加深地区国家的安全焦虑,使其更倾向于寻求霸权国的保护。从哥本哈根学派“安全化”的逻辑来看,话语建构通过“言语行为”将某个议题成功地定义为关乎生存的“存亡威胁”,从而使其可以采取非常规的紧急措施。<sup>②</sup> 在东亚地区,美国长期以来通过官方报告、媒体宣传和智库研究等方式建构“中国威胁论”,将中国的军事现代化、海外经济活动乃至正常的文化交流描绘成对地区和平、稳定和“基于规则的秩序”的破坏。近年来,随着大国竞争的白热化,这种话语建构更加细致化。例如,为推动其供应链“去中国化”,美国推出了“去风险”这一更具迷惑性的话语。相较于“脱钩”,“去风险”听起来更温和,但实际上更具有防御性,通过强调“供应链过于集中”所带来的经济安全风险劝说盟友和伙伴调整其对华经济关系。这种话语策略通过塑造他者的偏好和议程来达到自身的战略目的,从而弱化或者掩盖了其内在的强制属性。<sup>③</sup> 通过将与中国的经济合作“安全化”,美国力图扭转地区经济一体化趋势,重塑地区主义的经济合作逻辑。

第四,通过机制重塑分割地区合作网络。当原有的地区主义框架因其包容性而难以被直接改造时,霸权国会采取“另起炉灶”的策略,即建立全新的、具有

---

① Eleni Tsingou, “Club Governance and the Making of Global Financial Rules,” *Review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al Economy*, Vol. 22, No. 2, 2015, pp. 225 ~ 256.

② Barry Buzan, Ole Wæver and Jaap de Wilde, *Security: A New Framework for Analysis*, Boulder, CO: Lynne Rienner Publishers, 1998, pp. 32 ~ 33.

③ Joseph S. Nye, Jr., *Soft Power: The Means to Success in World Politics*, New York: Public Affairs, 2004, pp. 142 ~ 146.

鲜明排他性和竞争性指向的制度安排,其目的在于绕开并替代不再符合其战略利益的旧有机制,从而在地区内构建由其主导的、服务于其竞争目标的新秩序。机制重塑的核心作用方式是削弱现有制度的权威和功能。<sup>①</sup> 在安全领域,美国大力推动以小多边主义为特征的联盟网络建设,“四边安全对话”和“澳英美联盟”等机制成员少、目标集中、决策灵活,能够高效地整合核心盟友的力量,以应对特定的安全挑战。基于小多边机制,美国刻意绕开了东盟地区论坛等以东盟为中心、成员广泛、议程多元的传统地区安全架构,削弱了东盟的中心地位和实际效用。在经济领域,美国主导的“印太经济框架”则是典型的“俱乐部式”安排,从传统的关税减让转向聚焦于数字贸易、供应链安全、清洁能源等高标准议题,通过设立准入门槛,将战略对手排除在外,并以此为平台协调盟友和伙伴的经济政策。通过创建这些平行的、替代性的制度框架,美国不仅在事实上造成了亚洲地区合作和相关制度安排的进一步碎片化和阵营化,更是动摇了以东盟为中心的、开放包容的地区主义根基。

第五,通过施压胁迫提升不合作的成本。当观念塑造、利益诱导等软性手段不足以达到目的时,霸权国便会诉诸更具强制性的手段,即施压与胁迫。施压胁迫旨在通过单边行动提高目标国家不与美国合作的成本,压缩其战略自主空间,迫使其做出符合美国利益的选择。这一策略被部分学者称之为“经济治国术”,即利用经济工具来实现外交政策目标,近年来随着相互依赖武器化成为现实,施压胁迫策略的威力被进一步放大。<sup>②</sup> 美国对东亚地区国家的施压胁迫体现在多个方面。在经济方面,美国动辄以国家安全为由,对他国企业实施制裁和出口管制。在外交方面,美国通过高级官员的公开喊话和私下交涉,要求地区国家在中美之间做出明确选择,并对那些试图维持“对冲”或中立立场的国家施加压力。此外,美国还利用其在国际金融体系和技术标准制定中的主导地位对他国进行

---

<sup>①</sup> Julia C. Morse and Robert O. Keohane, “Contested Multilateralism,” *The Review of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s*, Vol. 9, 2014, pp. 385 ~ 412.

<sup>②</sup> David A. Baldwin, *Economic Statecraft*,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20, pp. 28 ~ 32; Henry Farrell and Abraham L. Newman, “Weaponized Interdependence: How Global Economic Networks Shape State Coercion,”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 44, No. 1, 2019, pp. 42 ~ 79.

“长臂管辖”，将国内法延伸至境外惩罚那些与美国对手进行正常交易的第三方实体。这些胁迫性手段虽然在短期内可能迫使一些国家屈服，但其滥用也严重损害了美国自身的信誉和其所倡导的“基于规则的秩序”，并可能激发地区国家的集体抵制，导致其霸权护持战略遭遇反噬。

### (三) 霸权护持战略与东亚地区主义的弱化逻辑

基于霸权护持的行动逻辑与策略选择分析可以看到的是，东亚地区主义弱化的核心逻辑在于霸权国霸权护持战略的转变，霸权护持通过多元策略作用于地区主义的关键支柱，将其推入“弱化螺旋”（见图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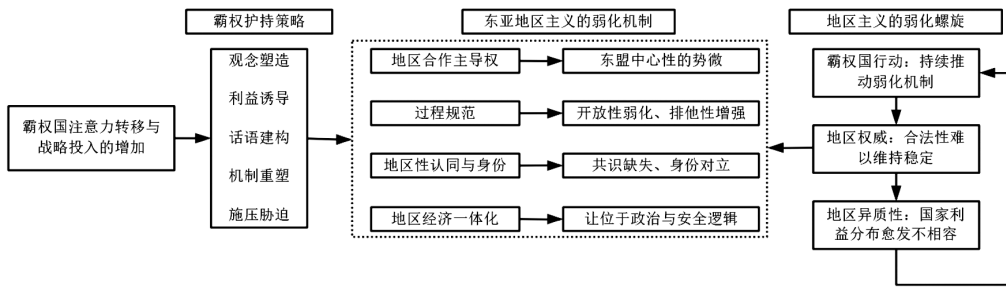


图1 霸权护持战略与东亚地区主义的弱化逻辑

资料来源：笔者自制。

地区主义弱化进程的起点源于霸权国(美国)对其全球和地区地位的威胁感知发生了系统性变化。当霸权国认为其主导地位受到了来自崛起国的挑战,并因此陷入“相对衰落”的焦虑时,其霸权护持战略便会从低威胁环境下的离岸平衡模式转向高威胁环境下的遏制挑战模式。从威胁平衡理论来看,这一战略转型表明霸权国的战略反应,不仅取决于对手的实力,更取决于其对对手意图、地缘邻近性和进攻能力的综合判断。<sup>①</sup>一旦对手被定义为具有修正主义意图的“威胁”,霸权国将倾向于大幅增加对相关地区的战略投入,其目标也会从维持现状转向重塑有利于自身竞争的地区环境。霸权国采取的多元策略发挥作用的机制

<sup>①</sup> Stephen M. Walt, *The Origins of Alliances*, Ithaca, NY: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87, p. 22.

在于其影响了东亚地区主义的四个基础要素——地区合作主导权、过程规范、集体认同和经济一体化。

首先,霸权国通过创建替代性制度侵蚀地区合作的主导权,导致东盟中心地位的式微。霸权国建立“四边安全对话”“澳英美联盟”等安全领域小多边机制的本质是一种“绕过”策略,其策略生效的关键在于利用了东盟内部在安全关切上的不一致(如南海声索国与其他成员国的立场差异)。机制竞争的核心是新旧机制之间对权威、资源和成员忠诚度的争夺,由霸权国主导、资源更丰富、目标更明确的新机制会对成员更分散、凝聚力更弱的旧机制构成严重挑战。<sup>①</sup> 这些新的小多边机制在议程设置、成员资格和决策方式上都独立于东盟主导的框架,从而事实上架空了东盟在地区安全事务中的核心地位。这使得东盟从过去地区合作的议程设置者弱化为日益被边缘化的参与者。

其次,在侵蚀地区合作主导权的同时,霸权国通过其“俱乐部式”的制度安排和胁迫外交等方式破坏地区合作的过程规范,使得地区主义的开放性弱化、排他性增强。以“印太经济框架”为例,其高标准的准入门槛和选择性的成员邀请违背了“东盟方式”所倡导的开放、包容和协商一致的核心原则,旨在建立排他性的规范性壁垒。与此同时,美国通过逼迫选边的外交施压,挑战了地区国家长期奉行的“对冲”战略和东盟所珍视的“中立”原则。地区合作的规范性原则的破坏会进一步冲击地区国家之间的互信基础,使合作氛围从协商与妥协转向猜忌与对抗,从而导致开放地区主义的衰败。

第三,霸权国的观念塑造和话语建构不断解构地区集体认同,导致共识缺失与身份对立。地区主义的维系不仅需要制度框架,更需要成员国之间的集体认同。美国通过大力推广“民主对抗威权”的叙事,在地区内制造意识形态裂痕,推动“他者化”过程的出现,将战略对手及其合作伙伴定义为与所谓民主阵营的“我们”根本对立的“他者”。<sup>②</sup> 这种做法在一定程度上冲击了基于地理、文化和共同

---

<sup>①</sup> Karen J. Alter and Sophie Meunier, “The Politics of International Regime Complexity,” *Perspectives on Politics*, Vol. 7, No. 1, 2009, pp. 13 ~ 24.

<sup>②</sup> Iver B. Neumann, *Uses of the Other: “The East” in European Identity Formation*, Minneapolis: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1999, pp. 20 ~ 35.

发展利益的、更为包容的“亚洲认同”或“东亚认同”，并构建起基于价值观划分的、充满对抗性的身份政治。当地区内的共识基础从“共同发展”转向阵营化的“应对威胁”时，地区合作便失去了内生动力。

最后，美国针对地区经济一体化采取的关键举措是促使该地区经济合作让位于政治与安全因素。在霸权国的整合性遏制战略下，经济、技术、贸易、投资等低政治议题都被赋予了地缘政治和国家安全的内涵。这种议题捆绑和安全化的做法使得原本驱动地区经济一体化的市场逻辑和比较优势原则，被迫让位于地缘政治和国家安全的战略考量。地区价值链布局的效率基础遭到破坏，转而重视所谓的“友岸”概念，技术的合作也愈发看重“安全”底线。其结果是，地区经济一体化作为东亚合作最成功的领域之一，其进程可能遭遇迟滞甚至逆转，东亚地区主义也可能因此失去最为坚实的压舱石。

在美国霸权护持战略的推动下，上述四个机制的共同作用可能将东亚地区主义推入“弱化螺旋”。霸权国为护持霸权而采取的不受约束的行动持续推动弱化机制发挥作用，集中破坏了地区既有的合作主导权、过程规范、地区性认同与身份以及地区经济一体化。这一针对地区主义的霸权护持模式在促使地区权威下降和规范失效的同时，将进一步加剧内部成员的分化与不信任，各国被迫采取加紧追随霸权国或寻求其他出路等更具机会主义的自保行为，进而催生互相猜忌的地区关系，反过来又为霸权国采取更不受约束的干预行动提供了更大的空间和更低的成本。“弱化螺旋”的启动会使地区主义的制度基础、规范共识和集体认同遭到进一步侵蚀，甚至于丧失提供地区公共产品、管理地区冲突和抵御外部干预的能力。

当然，本文的研究视角突出霸权护持战略的系统性影响，但是这并不意味着霸权护持战略可以单独地、即时地决定东亚地区主义的转变或发展。实际上，美国霸权护持战略是逐步深化或者转向的过程，而地区国家的应对方式、内部共识也存在一定的能动性，会影响地区主义的变化。因而，本文侧重于揭示霸权护持战略如何影响东亚地区主义及其具体策略和机制如何发挥作用。接下来，本文将通过案例研究来分析美国霸权护持战略的变化如何影响东亚地区主义。

### 三、从层次化走向竞争化：威胁判断、霸权护持与东亚地区主义的演变

以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为界,美国对威胁的判断分为不同阶段。在此基础上,本部分分析美国霸权护持战略如何从寻求均势转向实施遏制,并相应地探讨东亚地区如何从一个相对稳定、层次分明的国家间合作群体,演变为趋于竞争和分裂的对抗性场域,其合作框架在制度供给、议程设置与规范形态等方面出现了何种转变。

#### (一) 东亚地区主义的层次化：低威胁判断与霸权护持的均势逻辑

1991年冷战后至2008年,东亚地区主义的发展建立在“东亚经济奇迹”与冷战后美国“一超独霸”格局下其地区战略调整的基础上。在此期间,美国作为唯一的超级大国的霸权地位难以撼动,同时中国的经济总量在1992年尚不足美国的十分之一,美国在东亚地区的霸权护持战略遵循着维持稳定与参与的基线。克林顿政府对中国的认知也相对正面,强调中国应被视为潜在的合作伙伴。<sup>①</sup> 冷战后美国虽保有在亚太的军事主导权,但此时其国家安全战略主张“接触—扩展”,对东亚地区主义的政策是以观望和有限参与为核心。美国地区政策的目标并非直接塑造地区主义,<sup>②</sup>而是扮演“离岸平衡手”的角色,即防止任何单一地区大国,尤其是日本或崛起的中国主导东亚事务,并确保地区合作机制是开放的,特别是不能将美国排除在外。<sup>③</sup> 值得注意的是,这一时期美国将产业链与其国家安全保持了适当的距离,其政策目标仍主要围绕传统的地缘政治平衡与经济利益展开,经济相互依赖被视为促进繁荣和稳定的积极力量,尚未进入安全威胁来源的范畴。<sup>④</sup> 在这种寻求均势的战略指导下,美国通过其传统的“轴辐式”双边同

---

① The White House, “A National Security Strategy of Engagement and Enlargement,” February, 1996, <https://apps.dtic.mil/sti/tr/pdf/ADA311525.pdf>, p. 40.

② 韩爱勇:《东亚地区主义何以走向衰落?》,《外交评论》2015年第5期,第74~76页。

③ Christopher Layne, “The Unipolar Illusion: Why New Great Powers Will Rise,”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 17, No. 4, 1993, pp. 5~51.

④ 曹文娟、肖河:《构建“经济安全国家”:相互依赖时代的美国竞争战略》,《当代美国评论》2024年第3期,第68页。

盟体系维持其在东亚地区的安全存在,同时在经济上大力倡导以亚太经合组织为代表的“太平洋主义”。<sup>①</sup> 这一系列行动共同塑造了此时期东亚地区主义的层次化特征,而其核心动力主要源自地区内部国家的创造性。<sup>②</sup>

一方面,美国通过主导亚太经合组织,将地区合作的议程与自由贸易和投资便利化等议题相结合,并将澳大利亚、加拿大等泛太平洋国家引入其中,以此稀释和制衡可能出现的、纯粹的“东亚”身份认同。这种战略偏好在亚太经合组织于美国西雅图首次举办领导人非正式会议时就已定下基调。克林顿在开幕词中热情地描绘了一个“新的太平洋共同体”,强调“我们不想承担在亚洲军事存在的代价和地区领导的重担,却被排除在稳定带来的增长利益之外”。<sup>③</sup> 针对马来西亚总理马哈蒂尔于1990年提出的“东亚经济集团”构想,美国认为它是具有高度排他性、可能挑战其在亚洲经济主导地位的潜在威胁,因此联合盟友日本和澳大利亚否决了该构想,将之边缘化。另一方面,美国对可能挑战其地区金融或政治主导权的合作机制保持高度警惕。典型案例是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期间,美国坚决反对日本提出的“亚洲货币基金组织”倡议,最终联合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对该倡议实施否决。<sup>④</sup> 时任美国财政部副部长劳伦斯·萨默斯明确表达了美方的立场,他认为创立“亚洲货币基金组织”是要将美国排除在外,其可能采取独立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行动,进而导致亚洲国家推迟结构性调整、产生道德风险。<sup>⑤</sup> 这一划红线的行为,界定了美国所能容忍的地区主义的边界,即地区合作不能挑战美国主导的国际秩序。

有趣的是,美国在此期间的相对缺席和消极参与反而为东盟中心地位的崛起提供了战略空间。东盟巧妙地将自身定位为公正的中间人,通过其所倡导的

---

① David Shambaugh, *Power Shift: China and Asia's New Dynamics*,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2005, pp. 348 ~ 350.

② 魏玲:《发展地区主义与东亚合作》,《国别和区域研究》2019年第1期,第67~91页。

③ William J. Clinton, “Remarks to the Seattle Host Committee for the Asia-Pacific Economic Cooperation Ministerial Meeting,” *The American Presidency Project*, November 19, 1993.

④ Pablo Bustelo, “The Impact of the Financial Crises on East Asian Regionalism,” in Fu-kuo Liu and Philippe Regnier, eds., *Regionalism in East Asia*, London: Routledge, 2013, pp. 141 ~ 152.

⑤ Phillip Y. Lipsy, “Japan’s Asian Monetary Fund Proposal,” *Stanford Journal of East Asian Affairs*, Vol. 3, No. 1, 2003, pp. 1 ~ 12.

“中立纳入”策略将包括中、日、美在内的大国都纳入其主导的地区多边框架中。<sup>①</sup>面对美国对东盟主导的许多进程(如东盟地区论坛)的有限投入,以及对缅甸等国内政问题的不时干预,东盟成功地推动了以“10+3”(东盟+中日韩)为核心的东亚合作,这一机制在亚洲金融危机后迅速发展,启动了“清迈倡议”等多边货币互换安排,成为东亚地区主义的核心机制之一。当美国认为“10+3”发展势头过猛时,又通过盟友日本推动建立了成员范围更广的“东亚峰会”,即所谓的“10+6”,将澳大利亚、新西兰和印度纳入其中,以此来稀释中国在“10+3”中日益增长的影响力。<sup>②</sup>

概言之,这一时期的东亚地区主义是在美国“离岸平衡”战略下,由地区内生动力与外部有限干预共同塑造的结果。正是在这一阶段,亚洲的区域合作呈现出爆炸性增长的态势。到2000年,亚洲地区性组织的数量从1990年的9个增加到17个,区域论坛也大量涌现。<sup>③</sup>在亚洲金融危机期间,美国的强硬立场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失当处置,伤害了东亚国家的自尊心,促使其开始“抱团取暖”。在这个背景下,以“10+3”为核心的东亚合作机制应运而生。2000年“10+3”财长会议正式启动了“清迈倡议”,建立了区域性质的双边货币互换网络。“清迈倡议”虽形式上为货币互换安排,但本质上是对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信用秩序的区域性补充,是地区机制在美国局部设限的空间中展开有效的制度创新。这一机制彰显了东亚国家在美国划定的“红线”之下,以一种更具韧性、更符合地区实际需求的方式对地区金融合作进行的自主探索。随着中国经济的快速增长及其在“10+3”框架下影响力的提升,美国对于地区合作的“离岸平衡”策略开始聚焦于平衡中日两大地区强国的竞争。当中国积极推动建立“中国—东盟自贸区”并于2002年签署框架协议时,日本迅速跟进,并提出了建立范围更广的“东亚共同体”构想。面对中日两国日益激烈的制度竞争,东盟再度采取公正卷入的策略,一方

---

① Hidetaka Yoshimatsu, “ASEAN and Great Power Rivalry in Regionalism: From East Asia to the Indo-Pacific,” *Journal of Current Southeast Asian Affairs*, Vol. 42, No. 1, 2023, pp. 27 ~ 28.

② Troy Lee-Brown and Mark Beeson, “The Future of Asian Regionalism: Not What It Used to Be?” *Asia & The Pacific Policy Studies*, Vol. 4, No. 2, 2017, pp. 195 ~ 206.

③ Diana Panke and Jürgen Rüländ, “Why Asian States Cooperate in Regional Arrangements: Asian Regionalism in Comparative Perspective,”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Vol. 36, No. 3, 2022, pp. 429 ~ 430.

面欢迎中日两国积极参与,另一方面则坚决拒绝任何由单一地区大国主导的制度安排。在2003年12月的日本—东盟纪念峰会上,东盟明确拒绝了日本提出的签署特殊的“日本—东盟宪章”的提议,“不愿在众多对话伙伴中只与日本缔结一项特别协定”,坚持在统一的多边框架下与所有对话伙伴发展平等关系。<sup>①</sup>

美国寻求均势的战略基线促使东亚地区主义呈现出层次化特征。东亚地区主义的内圈是以“10+3”为核心的、凝聚力较强的东亚合作;外圈则是美国主导或深度参与的、更为松散的亚太经合组织和东亚峰会等跨区域平台。在上述地区主义发展进程中,地区国家较为一致地形成了特定的战略选择——对冲,并与经济利益共同成为亚洲国家加入地区组织最主要的两大驱动力,其对外战略也趋于一致:一方面,通过加入中国参与的机制来分享经济增长的红利;另一方面,又通过维系与美国及其盟友的合作,以确保自身与霸权主导秩序的政治联系和安全关系。<sup>②</sup>因而,东亚地区的各种国际机制并行不悖,尽管其形成了制度碎片化和功能重叠的“面条碗”现象,但这一时期的地区主义总体上是开放的、以经济合作为主导的,东盟的中心地位也得到了普遍承认和巩固。

## (二) 东亚地区主义的竞争化:高威胁判断与霸权护持的遏制逻辑

2008年金融危机是东亚地区主义发展历程中的重要转折点。危机的冲击不仅暴露了美国金融模式的脆弱性,也相应地凸显了中国经济的韧性,2008—2018年这十年内,中国GDP增长了近两倍,而美国仅增长了约1.5倍。中美经济体量差距的迅速缩小以及中国在国际舞台上日益强大的影响力,使得美国决策层的对华认知发生了转变,从“利益攸关方”转向了“最主要的战略竞争对手”。<sup>③</sup>美国在东亚地区的霸权护持战略也随之从维持稳定与寻求均势转向了维持优势与遏制挑战。

在维持优势和遏制挑战的新战略逻辑下,美国开始转向全面、深度地介入亚

---

① Hidetaka Yoshimatsu, “ASEAN and Great Power Rivalry in Regionalism: From East Asia to the Indo-Pacific,” *Journal of Current Southeast Asian Affairs*, Vol. 42, No. 1, 2023, pp. 27 ~ 28.

② Kuik Cheng-Chwee, “The Essence of Hedging: Malaysia and Singapore’s Response to a Rising China,” *Contemporary Southeast Asia*, Vol. 30, No. 2, 2008, pp. 159 ~ 185.

③ Kurt M. Campbell, *The Pivot: The Future of American Statecraft in Asia*, New York: Twelve, 2016, pp. 213 ~ 219.

大地区事务,试图将东亚地区主义框架改造为服务于其大国战略竞争的工具。这一进程始于奥巴马政府的“重返亚太”战略,其核心是通过“前置外交”、重振盟友关系以及主导《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谈判等方式,重夺地区议程的设置权和规则制定的主导权。奥巴马政府在推广《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时毫不掩饰其地缘战略意图,奥巴马多次公开强调:“我们不能让像中国这样的国家来书写全球经济的规则。应该由我们来书写这些规则,为美国产品开拓新市场”。<sup>①</sup>《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规则设计指向设立劳工、环保、国有企业等一系列远超世界贸易组织标准的“21世纪规则”,旨在试图构筑起将中国排除在外的、高门槛的经济俱乐部。<sup>②</sup>面对《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的挑战,中国和东盟共同推动了《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的谈判。与《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的“高标准”不同,《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采取了更具包容性、更照顾发展中成员不同发展水平的渐进路径。这两种规则的竞争体现了东亚地区主义内生的发展逻辑与美国主导的遏制逻辑之间的冲突。虽然美国因国内政治原因退出了《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但其继任者《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与《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并存的局面使得东亚地区持续面对两大相互竞争的自贸区体系,加剧了制度的堆叠问题。总体而言,奥巴马政府推出“亚太再平衡”后,美国在亚洲地区的制度构建和参与就愈发呈现出排他性,无论是主导《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建设,还是加入东亚峰会,美国或试图将中国阻隔在新制度之外,或谋求将现有制度引向制衡中国的路径。

2017年特朗普政府上台后,主张对华“全面脱钩”的强硬派观点在美国政坛崛起,“美国优先”的政策路线则大大加速了这一观念的贯彻。虽然特朗普政府以退出《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的方式暂时中断了经贸领域的遏制布局,但其后续推出的“印太战略”以及发动的对华贸易战和科技战,将大国竞争重点从经济转向了安全和科技领域。而拜登政府则将大国战略竞争进一步系统化为以

---

<sup>①</sup> The White House, “Statement by the President on the Trans-Pacific Partnership,” October 5, 2015, <https://obamawhitehouse.archives.gov/the-press-office/2015/10/05/statement-president-trans-pacific-partnership>.

<sup>②</sup> C. L. Lim, D. K. Elms and P. A. Low, eds., *The Trans-Pacific Partnership: A Quest for a Twenty-first Century Trade Agreement*,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2, pp. 3 ~ 11.

“投资、结盟和竞争”为核心的全政府、全方位战略,通过建立一系列不以东盟为中心、目标明确、成员精干的小多边机制,强化、网络化“四边安全对话”和“澳英美联盟”等同盟和伙伴体系,并构建“印太经济框架”等新的排他性机制,来对中国进行战略遏制。<sup>①</sup>

这一系列旨在改造地区秩序的行动引发了地区主义的弱化趋势。首先,东盟的中心地位遭到严重侵蚀。“四边安全对话”和“澳英美联盟”等小多边机制的建立,绕开东盟,削弱了东盟地区论坛等传统地区安全架构的权威性。美国主导的这些多边机制成员精干(美日印澳、美英澳)、议程明确(主要针对中国)、决策高效(美国主导),与成员广泛、议程分散、决策缓慢的东盟地区论坛形成了鲜明对比。<sup>②</sup>同时,在构建和扩展小多边机制的过程中,美国实施了针对性的利益诱导,通过提供替代性的安全产品和收益,诱导那些对地缘政治风险更为敏感的成员脱离以东盟为中心的合作框架。例如,“澳英美联盟”协议直接向澳大利亚提供核潜艇技术,对于澳大利亚而言其是远比在东盟地区论坛框架内进行合作更有吸引力的替代收益。面对美国的战略布局,东盟努力维持团结,于2019年推出了自己的《东盟印太展望》,试图以一种更具包容性、强调对话与合作的方式对冲美日等国的“自由开放的印太”构想,重申东盟的中心地位,但难以有效制约美日等国日益零和化的行动。<sup>③</sup>

其次,开放包容的过程规范遭到侵蚀。“印太经济框架”成员资格的选择性和美国逼迫选边的外交姿态,使得亚洲地区合作的“俱乐部”色彩和排他性空前增强。以“印太经济框架”为例,其成员资格是封闭式的,由美国根据其战略亲疏和价值观标准进行选择邀请,违背了东盟长期坚持的开放、包容原则。更重要的是,“印太经济框架”的议程设置完全由美国主导,其内容避开了亚洲国家最关心的关税减让和市场准入,聚焦于数字贸易、劳工标准、环境标准等美国具有优

---

① The White House, “Indo-Pacific Strategy of the United States,” February 11, 2022, <https://bidenwhitehouse.archives.gov/wp-content/uploads/2022/02/U.S.-Indo-Pacific-Strategy.pdf>.

② 刘艳峰:《东盟国家对美国“印太”小多边框架的认知及反应》,《现代国际关系》2024年第6期,第101~120页。

③ Mie Oba, “Further Development of Asian Regionalism: Institutional Hedging in an Uncertain Era,” *Journal of Contemporary East Asia Studies*, Vol. 8, No. 2, 2019, p. 133.

势的领域,抢夺地区相关规则的制定权。亚洲国家对于“印太经济框架”的反应也体现了其复杂的对冲心态。一方面,包括多个东盟成员国在内的14个初始成员选择加入谈判,希望从中获得数字经济、绿色技术等前沿领域的好处,并以此作为维系与美国经济关系的重要纽带。另一方面,东盟国家对“印太经济框架”缺乏实质性的市场准入承诺普遍感到失望,并对其背后强烈的地缘政治意图保持警惕。这种矛盾心态使得“印太经济框架”的谈判进程变得困难重重。<sup>①</sup>例如,在“印太经济框架”的“贸易”支柱谈判中,拜登政府力图将“强有力且可执行”的劳工标准作为“贸易”支柱的核心,其官方声明要求各成员国“采用、坚持并加强有关劳工权利的国家法律”,而越南和印尼等国明确拒绝美国提出的、具有强制惩罚性的争端解决机制,担心其会削弱本国出口产品的竞争力。这反映了东亚地区主义在美国遏制挑战的战略下正日益陷入选边困境。<sup>②</sup>

再次,地区身份和认同被撕裂。自特朗普第一任期以来,美国大力构建的“民主对抗威权”叙事使得地区国家陷入身份认同的困境,分化了东盟内部的团结。这种身份塑造和“他者化”叙事策略通过强调价值观的对立,试图将国家利益和地缘政治竞争简化为正邪分明的意识形态斗争。这种叙事已经在地区内制造出明显的裂痕。例如,在南海问题上,菲律宾在小马科斯政府上台后显著加强了与美国的军事同盟关系,不仅向美军开放更多军事基地,还与美国、日本、澳大利亚等国频繁举行联合军演,在仁爱礁等问题上对华采取了更激进的挑衅行动。其关键驱动因素是美国希望将菲律宾打造为自身东南亚战略的支点,并提供了大量安全承诺和支持。<sup>③</sup>与此同时,柬埔寨、老挝等国则持续推进与中国在经济交往和“一带一路”框架下基础设施建设方面的紧密合作,在地缘政治上与中国保持更近的关系。这种分化导致东盟在重大安全议题上难以形成统一立场,其内部的“协商一致”原则面临前所未有的考验,严重削弱了其作为单一行为体的

---

① 徐秀军、常方煜:《政治极化与美国“印太经济框架”实施路径》,《东北亚论坛》2024年第6期,第16~31页。

② 张天桂:《“印太经济框架”新进展及其对亚太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影响》,《国际论坛》2024年第4期,第137~154页。

③ 宋伟、黄诗敬:《美菲海洋安全合作的发展态势及其局限》,《东南亚研究》2025年第3期,第95~118页。

集体行动能力。<sup>①</sup>

最后,经济合作逻辑被安全逻辑所取代。拜登政府提出一系列有关“友岸外包”和“去风险”的倡议,使得地区供应链的布局愈发强调所谓的安全优先,严重阻碍了以《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为代表的地区经济一体化进程。<sup>②</sup> 在安全逻辑的主导下,美国通过《芯片和科学法案》等国内立法,明确要求获得补贴的企业不得在中国扩大先进制程芯片的生产,并联合日本、荷兰等盟友对华实施半导体设备和技术的出口管制,打断了东亚地区内部高度整合的半导体产业链,人为地制造了地区供应链的“断点”。韩国的三星、SK海力士、日本的东京电子等企业都被迫削减对华技术和资金投入以及相关出口业务。<sup>③</sup> 需要指出的是,美国的策略并非仅仅是“去中国化”,而是诱导产业链向其认可的“友岸”国家转移,这在东南亚国家内部引发了新的经济竞争。例如,越南和马来西亚因其在电子组装等领域的潜力成为美国“友岸外包”策略的重点拉拢对象,美国通过《印太经济框架》引导半导体封装、电子终端制造等产业向越南、马来西亚转移。<sup>④</sup> 但这一过程是一种地缘政治驱动的战略转移,缺乏产业升级或转移的经济理性。在东南亚国家技术水平、人力资本等要素差距不大的情况下,美国的“友岸”转移政策加剧了东盟成员国之间在承接产业链方面的竞争,削弱其在面对外部压力时作为整体进行谈判的能力,破坏了东盟内部的团结。

总而言之,在美国实施遏制的霸权护持战略驱动下,东亚地区主义的性质发生了一定程度的改变,呈现出竞争化的特征,地区合作平台成为美国推动大国博弈的角斗场,合作议程被安全议题主导,开放包容的原则遭遇集团式对抗的冲击。霸权护持战略从离岸平衡到遏制挑战的转变是驱动东亚地区主义从层次化

---

① 翟崑:《特朗普2.0冲击下东盟大国平衡战略的发展前景》,《当代世界》2025年第2期,第16~21页。

② 张弛:《竞争性地区主义与亚洲合作的现状及未来》,《东北亚论坛》2021年第2期,第90页;Julien Chaisse and Pasha L. Hsieh, “Rethinking Asia-Pacific Regionalism and New Economic Agreements,” *Asia Pacific Law Review*, Vol. 31, No. 2, 2023, p. 452.

③ 聂正楠、夏方波:《“同袍异志”:美国盟国对华半导体网络化制裁的政治经济逻辑》,《当代亚太》2024年第6期,第84~110页。

④ Francesco Guarascio, “Engineer Shortage May Harm US Plan to Turn Vietnam into Chips Powerhouse,” *Reuters*, August 31, 2023, <https://www.reuters.com/technology/engineer-shortage-may-harm-us-plan-turn-vietnam-into-chips-powerhouse-2023-08-31/>.

滑向竞争化,并陷入“弱化螺旋”的核心动力。可以说,在美国遏制性护持战略持续推进的背景下,东亚地区主义的制度权威、合作惯性和集体认同正遭受冲蚀,已具备“弱化螺旋”的结构特征:合作主导权遭削弱,过程规范被破坏,成员行为趋于对冲,合作意愿与能力持续下降。随着美国对华政策竞争态势越发明确化和系统化,区域合作的开放性与凝聚力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

#### 四、特朗普 2.0 时代与中国推动东亚地区主义发展的战略机遇

2024 年特朗普再度当选美国总统,使得美国国内政治的极化以及对外政策的不确定性急剧上升,成为影响东亚地区秩序和地区主义发展新的关键变量。特朗普政府的对外政策风格,可能会以一种极端的方式改变本文所描述的“弱化螺旋”,同时,也为中国化危为机、推动东亚地区主义重回正轨提供独特的战略机遇。

##### (一) 特朗普 2.0: 东亚地区主义“弱化螺旋”的转机?

特朗普第二任期的霸权护持战略在威胁认知和对华竞争目标上与拜登政府一致,但在战略风格和工具选择上显著不同,即从拜登政府的排他化重塑转向以交易为核心的单边主义模式。特朗普第二任期迅速践行其竞选承诺,对外经济与安全政策行动清晰地指向“以美国利益优先”重塑多边合作体系,通过主动制造不确定性来最大化美国的单边利益。特朗普 2.0 时期的对外政策可能成为东亚地区主义“弱化螺旋”的转机。短期来看,特朗普政府的单边主义行动对地区既有合作主导权与经济一体化产生了直接冲击,引发了地区成员机会主义行为倾向和内部分化的反应。特别是以“对等关税”为核心的单边主义关税行动,构成了对地区合作制度与规范的直接挑战。2025 年 4 月,特朗普政府宣布实施“对等关税”政策,此举在两个层面上破坏了东亚合作的规范基础。其一,以双边贸易差额作为征收惩罚性关税的唯一标准,挑战了《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等以“最惠国待遇”和“非歧视”为基石的多边贸易体制和区域贸易安排的基本原则。其二,美国坚持只与单个国家进行豁免谈判,拒绝与东盟作为一个组织进行

集体磋商,这否定了东盟长期以来所珍视的集体行动和协商一致的合作规范。这种做法将复杂的区域经济关系简化为零和的、一对一的权力博弈,动摇了地区合作的规范共识。

制度权威的有效性取决于其成员在面对外部冲击时采取集体行动的能力和意愿。然而,在“对等关税”的冲击下,东盟的应对暴露出其权威的脆弱性,霸权国不受约束的单边压力对于成员国的分化与机会主义行为的刺激作用也随之浮现。尽管东盟层面针对“对等关税”发表了联合声明,但各成员国的实际行动却出现显著分化。<sup>①</sup>例如,越南在美国政策宣布后迅速采取了单边示好的行动,抢在东盟形成统一立场之前便向美国提出了让步方案。这种“抢跑”行为具有显著的机会主义特点,反映出当集体保护机制的预期功能不足时,个体成员会优先选择通过直接讨好霸权国来规避风险,而非信赖共同体的制度框架。但是,这种行为不仅破坏了东盟内部的团结,更向外部世界传递了东盟集体行动能力不足的信号,进一步削弱了东盟作为地区合作中心的权威性。<sup>②</sup>

不过,特朗普的亚洲政策体现不以联盟、机构或价值规范为主轴,而以交易性、利益导向与双边施压为特征,其战略目标缺少对于东亚地区主义的明确指向和布局,甚至有系统性地偏移拜登政府对东亚地区主义改造策略的倾向。特朗普政府任命的包括负责亚洲经济、安全和外交政策的官员间立场分歧显著,使政策执行时常出现波动,也为美国在亚太的霸权护持增添了不确定性。在印太战略上,特朗普政府强调“印太是优先战场”,但同时通过公开言论向日韩等盟友施压,要求其承担更多防务成本。此外,特朗普对台湾问题持“经济等价”立场,认为台湾“抢走了美国的芯片业务”,应为其安全防卫“付费”。<sup>③</sup>这种交易式安全逻辑严重削弱了美国安全承诺的可信度。2025年香格里拉对话会上,美国国防部长皮特·赫格塞思明确要求亚洲盟友提高军费开支,强调美国安全承诺并非无

---

① “Special AEM Joint Statement on Unilateral Tariffs Adopted,” ASEAN, April 10, 2025, <https://asean.org/wp-content/uploads/2025/04/04-special-AEM-Joint-Statement-Unilateral-Tariffs-Adopted.pdf>.

② 薛松:《特朗普“对等关税”政策对东南亚的冲击与应对》,南京大学中国南海研究协同创新中心“海洋安全与发展”研究报告,第37期,2025年5月。

③ “Trump Says Taiwan Should Pay for Defence, Sending TSMC Stock Down,” Reuters, July 17, 2024, <https://www.reuters.com/technology/tsmc-shares-fall-more-than-2-after-trump-says-taiwan-should-pay-defence-2024-07-17/>.

条件,也并非常态。<sup>①</sup> 然而,特朗普政府官员对于盟友国防开支占 GDP 比重的表述莫衷一是,赫格塞思认为应是 3%,特朗普本人和国防部副部长布里奇·科尔比则公开坚持应为 5%。<sup>②</sup> 这一转移成本但又模糊不清的政策主张动摇了传统的联盟信任,例如 2025 年 7 月 1 日举行的美日 2+2 安全会谈因特朗普要求日本提高国防开支而遭日方取消,澳大利亚总理阿尔巴尼斯则强调“将根据国家利益决定防务投入”,而不是单纯地应对外部压力。<sup>③</sup> 而在特朗普偏好个人主义的外交协调的情况下,美韩同盟关系也受到一定冲击,韩国更是被赫格塞思排除出亚太盟友“核心小组”(主要指日本、澳大利亚及菲律宾)。尽管韩国总统李在明主张走务实主义路线,肯定美韩同盟的重要性,但其对外政策仍以对冲战略为核心特征。<sup>④</sup>

与此同时,在盟友经贸关系方面,特朗普政府也对菲律宾、澳大利亚、日本和韩国实施关税威胁。作为拜登政府核心地区性经贸机制的“印太经济框架”也可能被特朗普政府废止,而“四边安全对话”与“澳英美联盟”则可能因不信任以及成员双边关系的不确定性而面临动力不足的问题。特朗普政府针对“澳英美联盟”开展审查引起澳大利亚政府的恐慌,也迫使英国调整其国防规划。<sup>⑤</sup> 特朗普第二任期以来“美国优先”的经贸与安全政策极大地冲击了利益诱导模式,使得美国亚太盟友国家处于高度的战略焦虑之中,随着合作不确定性上升而趋向战略保守。上述一系列行动在很大程度上破坏了拜登政府时期尝试重塑的、突出

---

① Meia Nouwens, “US Commitment to the Indo-Pacific: Peace Through Strength,” June 12, 2025, <https://www.iiss.org/online-analysis/online-analysis/2025/06/us-commitment-to-the-indo-pacific-peace-through-strength/>.

② Zack Cooper, “Pete Hegseth’s Surprisingly Unsurprising Message at the Shangri-La Dialogue,” June 17, 2025, <https://pacforum.org/publications/pacnet-49-pete-hegseths-surprisingly-unsurprising-message-at-the-shangri-la-dialogue/>.

③ “Japan Scraps US Meeting after Washington Demands More Defense Spending, FT Reports,” Reuters, June 21, 2025, <https://www.reuters.com/world/asia-pacific/japan-scraps-us-meeting-after-washington-demands-more-defense-spending-ft-2025-06-20/>; Kirsty Needham, “Australia’s Albanese Says He will Press AUKUS, Indo Pacific Security in Trump Meeting,” Reuters, June 16, 2025, <https://www.reuters.com/world/asia-pacific/australias-albanese-says-he-will-press-aukus-indo-pacific-security-trump-meeting-2025-06-16/>.

④ Andrew Yeo, “What South Korea’s Presidential Election Means for the US-Korea Alliance,” June 3, 2025, <https://www.brookings.edu/articles/what-south-koreas-presidential-election-means-for-the-us-korea-alliance/>.

⑤ Mercy A. Kuo, “Trump 2.0 and US Leadership in the Indo-Pacific,” *The Diplomat*, February 12, 2025, <https://thediplomat.com/2025/02/trump-2-0-and-us-leadership-in-the-indo-pacific/>.

封闭性与排他性的过程规范,针对盟友施加的压力与政策调整大幅降低了小多边机制的内在凝聚力。

需要指出的是,特朗普第二任期以来的行动不仅破坏了地区政策的连续性,而且摒弃了拜登政府时期坚持的观念塑造和话语建构,例如特朗普肯定杜特尔特“毒品战争”政策的成效,并且强调“对以往政府那种说教式的政策不感兴趣”,也不会“向其他国家施压,迫使他们接受或采纳其政策或意识形态”,民主、人权等价值观与话语建构在其地区战略中的优先级明显下降。<sup>①</sup>这意味着美国为弱化东亚地区性认同长期构造的身份对立机制面临中断。可见,特朗普第二任期的早期行动明确削减了包括利益诱导、观念塑造以及话语建构等多个霸权护持策略的使用,其不受约束的、机会主义的政策主张使得美国在东亚地区主义护持策略上处于行动失序的状态。这不仅导致美国主导的小多边机制与地区经济合作处于停滞状态,机制内部互信与协作受损严重,也使得地区性认同与身份、地区经济一体化等东亚地区主义的重要维度或许可能得到更多的发展空间。

## (二) 特朗普 2.0 冲击东亚地区主义的可能场景与中国周边外交机遇

特朗普第二任期挥舞关税大棒、转移安全成本等具有鲜明“美国优先”特征的政策对东亚地区主义的影响大致存在两种可能的走向。其一,霸权护持战略的再体系化,即特朗普政府恢复针对东亚地区主义的多元策略,从而重启“弱化螺旋”。再体系化的核心在于特朗普政府能否将交易主义、单边压力与观念塑造、话语建构以及利益诱导等策略进行有效融合,构建更高效的胁迫体系。例如,特朗普政府类似“对等关税”的政策正在演变为针对中国的战略布局。在 90 天关税谈判期限临近的过程中,可以看到美国倾向于将豁免条件与更敏感的安全与供应链等议题挂钩,例如要求菲律宾在南海问题上采取更激进的行动,或要求特定国家限制与中国的科技合作与贸易关系、在供应链上加速“去中国化”,包括在与越南的关税谈判中提出了减少对中国工业品进口依赖的要求、迫使马来

---

<sup>①</sup> Matthew Olay, “Hegseth Outlines U. S. Vision for Indo-Pacific, Addresses China Threat,” May 30, 2025, <https://www.defense.gov/News/News-Stories/Article/Article/4202504/hegseth-outlines-us-vision-for-indo-pacific-addresses-china-threat/>.

西亚与泰国加入美国主导的关键矿产供应链等。<sup>①</sup> 尽管特朗普政府大概率仍将持续轻视以东盟为中心的多边机制,但这并不意味着其完全放弃了既有的替代性制度。相反,特朗普政府依旧存在一定可能选择性地利用或改造“四边安全对话”或“澳英美联盟”等小多边机制,将其作为施压和利益分配的核心渠道,通过将经贸利益与这些安全机制捆绑,美国可以对其盟友和伙伴进行精准操纵,从而加剧地区内部的制度竞争与阵营分化。

其二,地区主义的韧性反弹与“反向螺旋”可能形成。特朗普政府的极限施压并非总能奏效,在地区国家认为与美国达成交易成本过高的情况下,反而可能激活并强化地区自身的合作动力的“反向螺旋”,关键在于共同的外部威胁可能催生内部团结。由于特朗普政府的关税政策是无差别的打击,不仅针对中国,也同样严重损害了越南、马来西亚、泰国等东盟国家的利益。当面临共同的、清晰的外部经济威胁时,东盟成员国之间抱团取暖的动机将显著增强。2025年5月27日举行的东盟—中国—海合会三方峰会,正是在“对等关税”宣布后不久召开的,其寻求加强彼此贸易关系的目标,是对美国贸易保护主义的集体应对的立场表达,也显示出区域一体化的内生动力正在被唤醒。<sup>②</sup> 未来,东亚地区可能会建立更有效的协调机制以共享谈判信息、协调对策,从而在对美谈判中形成事实上的集体谈判态势,增强整体议价能力。另一方面,霸权过度失信能够为中国扩展地区领导力创造空间。特别是当美国的安全承诺变得不可靠、经济政策变得不可预测时,地区国家对稳定和确定性的需求会空前高涨,这为中国强化地区经贸关系与政治互信提供了历史性机遇。同时,中国的应对基础独具优势。在经济方面,中国正在积极推动高质量实施《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并申请加入《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和《数字经济伙伴关系协定》。这不仅是扩

---

① Francesco Guarascio and Phuong Nguyen, “Exclusive: US Made ‘Tough’ Requests to Vietnam in Trade Talks, Sources Say,” Reuters, June 4, 2025, <https://www.reuters.com/world/china/us-made-tough-requests-vietnam-trade-talks-sources-say-2025-06-03/>; “Trump Strikes Deals on Trade, Critical Minerals in Southeast Asia,” Reuters, October 27, 2025, <https://www.reuters.com/world/china/us-sign-trade-deals-with-cambodia-malaysia-trump-says-2025-10-26/>.

② 《社评:这场三方峰会昭示全球南方发展新趋势》,环球网,2025年5月26日,<https://hqttime.huanqiu.com/article/4MplSzc1oy0>。

展贸易的行为,而且是向地区提供并强化替代美国贸易保护主义的、基于规则的、开放的国际公共产品。当美国在破坏规则时,中国则在拥护和构建规则,这种对比将提升中国的制度性领导力。在安全与外交方面,中国也在积极推动“南海行为准则”的磋商,并与东盟国家建立双边磋商机制。这也与美国激化矛盾的做法形成鲜明对比,展现了中国作为负责任大国的形象。

无论是上述任一场景出现,由于东亚与东南亚都是关系中国周边安全与稳定的重要地区,中国应该抓住美国霸权失去自我约束以及地区国家面临高度不确定性的契机,努力稳定地区合作,扩展地区主义发展的空间。其一,提供更多制度性的国际公共产品,以多边主义的确定性对冲特朗普政府单边主义的任意性。当特朗普政府以双边交易瓦解多边框架、导致东盟中心地位被侵蚀时,中国应更加坚定地支持东盟,高质量地参与并维护以东盟为中心的多边机制。这不仅是外交姿态的展示,更是向地区提供当下尤为宝贵的制度稳定性,以此凝聚地区共识,共同抵制霸权国的机会主义行为。其二,提供开放融合的经济机遇,以合作共赢的引力抵消美国贸易保护主义的推力。当特朗普政府挥舞“对等关税”大棒,迫使地区国家陷入零和博弈时,中国应以更大的决心深化区域经济一体化。通过高质量实施《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积极加入《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等,构建开放、包容、非歧视的区域性市场。这将为在外部压力下寻求出路的地区国家提供极具吸引力的替代选项,有效化解其被迫“选边站”的压力。其三,提供建设性的安全观与伙伴关系,以共同安全的稳定化解地区国家对于美国交易性安全政策的战略焦虑。相比于特朗普政府的交易型外交风格将美国传统的安全承诺“商品化”,中国应继续秉持“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新安全观,积极推动“南海行为准则”磋商等和平对话进程。通过发展平等伙伴关系,中国可以为地区提供区别于军事同盟的、更具包容性的安全合作机制,以促进安全领域的替代性机制支撑地区政治互信。

总而言之,特朗普2.0时代可能带来的地区合作混乱为中国提供了展示自身作为“负责任大国”形象的机会窗口。通过坚定维护多边主义和开放地区主义,深化经济融合,并为地区提供和平与发展的确定性,中国可以在抑制霸权护

持战略的破坏性影响的同时,引领东亚地区主义走出“弱化螺旋”,迈向更加健康、可持续的多边主义未来。

## 五、结 论

东亚地区主义的演变与弱化,是美国为维护其霸权地位而进行主动塑造和系统性改造的结果。为实现这一改造,十余年来美国综合运用了观念塑造、利益诱导、话语建构和施压胁迫等多元策略。这些策略作用于东亚地区主义的四大支柱,促使其趋于弱化:侵蚀东盟中心地位、破坏开放包容的过程规范、解构地区共同认同、扭曲经济合作的发展逻辑,将东亚地区主义推入由美国霸权护持多元策略驱动的“弱化螺旋”。

在世界进入动荡变革期的背景下,美国霸权护持战略的调整正将东亚地区主义的发展推向十字路口。未来5到10年,美国对华展开的所谓“战略竞争”将更趋激烈,而为强化其实力地位,美国正在全面重塑其地区战略,将东亚地区作为其检验威慑挑战与经济安全化理念的前沿地带。通过构建“四边安全对话”“澳英美联盟”等小多边机制,并以“友岸外包”等名义操弄供应链安全,美国试图在地区内系统性地构建排斥中国的、以其自身利益为核心的新秩序,大力构筑对华施压的统一阵线。这种霸权护持战略的强势介入已成为驱动东亚地区主义走向竞争化、阵营化的核心外部动力。

与此同时,也要看到美国改造地区秩序的行动面临着许多内在矛盾与限制性因素。第一,霸权行动自身的失序正侵蚀其合法性根基。受到美国国内民粹主义、政治极化等因素影响,美国对外政策的可预测性和稳定性急剧下降。特朗普2.0政府所代表的“交易主义”联盟观,要求盟友支付保护费,冲击了联盟的信任基础。特朗普政府对联盟、机构、法治和价值观都不太关心,将迫使盟友承担更多负担,并质疑美国承诺的可靠性。一个失序的霸权难以构建稳定的秩序。第二,地区主义的内生韧性构成了强大的“反作用力”。霸权护持战略的压力并未完全消解地区合作的动力,反而已经在一定程度上激发了地区国家的制度对

冲和战略自主。东盟努力推出的《印太展望》,以及在中美之间拒绝选边站的普遍立场,都表明地区国家不愿完全被动地卷入大国竞争的漩涡,而希望突出维护自身利益和地区架构的中心地位。第三,经济逻辑惯性限制了地缘战略的改造空间。尽管美国力推“去风险”和供应链重塑,但东亚地区在过去数十年形成的、以效率为核心的经济一体化网络具有强大的黏性,私营部门不会全然按照美国政府的期待去实施所谓的对华遏制。小部分国家虽推行了“中国+1”的策略,但更多是企业分散风险的商业行为,这种经济理性构成了对美国极端政策的天然制约。

面对美国日益失序的霸权护持行动,中国需要从寻求构建“相互尊重、和平共处、合作共赢”新型大国关系的角度予以积极应对。这要求中国更精巧地应对美国的遏制政策与战略布局,在外线博弈中开辟更广阔的运筹空间。中国近年来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和“人类命运共同体”等理念正是对冲美国“集团政治”的重要战略布局。在此基础上,中国需要对各种层次的伙伴关系进行巩固和调整,将东盟作为经营周边的重中之重,积极打造稳定、繁荣的“新中间地带”,妥善处理与中小国家之间的矛盾,避免陷入美国制造的“打地鼠”式战略困境。在实践中,中国外交需要进一步增强对地区多边机制的支持和投入,善于利用气候变化、全球公共卫生、数字经济治理等议题,与美国及其盟国、伙伴国家展开功能性合作,努力消解美国主导的地区秩序建构中的零和性与对抗性,为最终引领东亚地区主义走出“弱化螺旋”、迈向更加包容和可持续的未来,贡献中国的智慧与力量。

【责任编辑:龙菲】